

品閱袖珍——世代變容下的臺灣小開本轉貌

■ 蔡承豪

小開本書籍的刷印有著悠久歷史，且因其尺寸小巧及價格等優勢，在出版界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臺灣島上活動的子民，自十七世紀以降開始引入、接受各式袖珍書籍，並反饋為袖珍本中的知識來源之一；至十九世紀，更發展出具本地特色的小開本。書籍作為文化訊息之重要載體，觀察這段變化，可讓我們從不同的面相，體會臺灣閱讀市場的轉躍與多樣。

袖珍本裡話「臺灣」

傳統所稱的「巾箱本」，係指書之開本小至可置於古人放頭巾的小盒子裡而得名，類似現今所稱的「袖珍書」、「口袋書」、「掌中書」，與日本方面攜帶閱讀的「文庫本」精神亦甚類似。隨著雕版印刷術日趨成熟後，自唐而宋，版印逐漸取代抄寫，成為書籍出版的主要形式，除帶動出版數量的增加，並讓書籍的款式得以更為多樣。至明清之際，「袖珍」一詞，逐漸取代「巾箱」，成為小尺寸的精巧書籍之代名詞。且隨著科舉考試、商販移動、生活指南等等需求，袖珍本小巧易攜，利於流通，終能異軍突起，受到官紳、士子、商賈、醫者等跨階層的關注，成為出版市場的另一寵兒。在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近期舉辦的「古人掌中書——院藏巾箱本特展」內，便可細細觀覽各式質量兼備、甚具巧思且難得一見的巾箱本。（圖1、2）

臺灣自十六世紀末以降，隨著明代解除海禁後東南沿海貿易之興盛，及西方勢力東



圖1 位於故宮正館103、104陳列室的「古人掌中書——院藏巾箱本特展」 謝明松攝

來欲尋求長途貿易，島嶼的內在面貌遂逐漸為華人官紳所知曉。如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欲拓展東亞貿易，十七世紀初起，便積極駕船於中國南方及東南沿海水域往來活動，探求契機，並引發諸多衝突、爭奪與糾紛，先是襲擊葡萄牙人於澳門的據點，更於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佔領澎湖，與明朝海軍交戰。等等相關傳聞，因而被部分仕紳文人紀錄於官書、方志或文集當中。



圖2 「古人掌中書——院藏巾箱本特展」展場內陳設各式精巧的袖珍本文物 謝明松攝

以本院所藏明人沈德符（1578-1642）所撰瑣聞性筆記《萬曆野獲編》為例，沈氏為浙江秀水（今浙江嘉興）人，萬曆四十六年（1618）舉人。其自幼喜聞朝野故事，又因家學淵源，與當時士大夫及故家遺老、中官助戚交往，近搜博覽，博洽多聞，對時事和朝章典故爛熟於胸。其所撰成之《萬曆野獲編》巨作，內容包羅萬象，對於十六、十七世紀的市景、珍玩、海外貿易等項目，頗有記載；即便未被收入《四庫全書》當中，但仍是足資反映晚明時代面貌，瞭解各地風俗與官紳文士生活樣態的重要古籍。而當中有「紅毛夷」一條，計五百餘言，內容初始便載「紅毛夷自古不通中國，亦不知其國何名，其地在何所。直至今上辛丑始入粵東海中，因粵夷以求通貢，且於澎湖互市，不許，次年又至閩海。」萬曆辛丑年，為萬曆二十九

年（1601），係荷蘭東印度公司首次派遣艦隊欲與明朝交涉通商之年。其計畫向明廷租借貿易基地，對象包括了澎湖，但明廷不予理會，遂無功而返。然東印度公司仍持續派船前往福建沿海，後終造成戰爭，日後並成為沈德符筆下的異聞記事。

《萬曆野獲編》發行後頗獲關注，該書並在清代由錢枋重新編輯，製作成縱 17.9 公分、橫 11.3 公分的巾箱本尺寸發行，此種開本想必更便於流通，也讓臺澎海上風雲得以更為人所知。後為晚清著名藏書家、至東瀛訪書且攜回不少珍貴漢籍而為世所重的楊守敬（1839-1915）所蒐羅，並輾轉進入本院典藏。（圖 3）

晚清部分工具類書，亦以小開本形式發行，可使價格相對低廉，且尺寸、重量輕便，便於使用者往返挈帶。院藏當中，如光緒



圖3 明 沈德符撰 清 錢枋輯 《萬曆野獲編》 清刊巾箱本 故觀003512-00352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二十一年（1895）由北京松竹齋、榮寶齋以巾箱本形式發行的《大清緝紳全書》，是一本清代職官錄。此類或稱為《爵秩全覽》的書籍，開本小，攜帶便利，主要用於迅速翻檢當代官

職姓名、職銜、籍貫等，並可資瞭解一省之行政架構，可以說是一部內容具體的職官志。查找當中臺灣省部分，可知在乙未割讓前所設置之行政機構幾已遍及全臺，而在原住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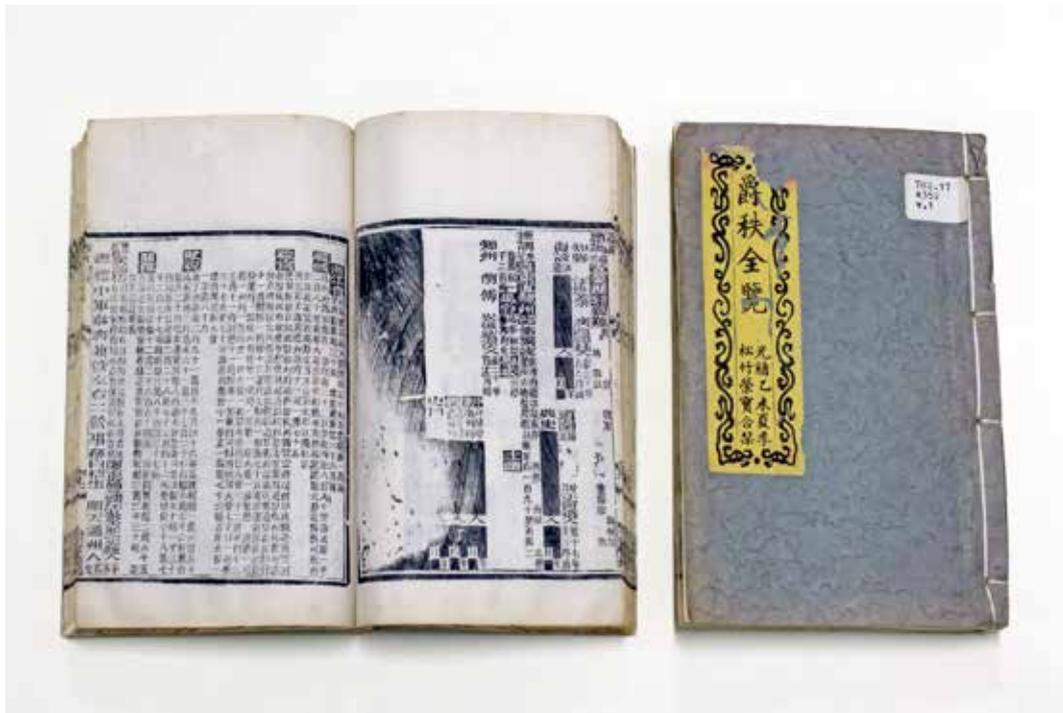


圖4 | 不著編人 《大清緝紳全書》 清光緒21年北京松竹齋榮寶齋合刊巾箱本 贈善025989-02599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眾多的東部地區，並建置有臺東直隸州，由胡適（1891-1962）之父——胡傳（1841-1895）出任知州，上載胡傳為安徽績溪人，為歲貢，（光緒）二十年十二月補。透過此書，可快速掌握各地職官情況，甚為便捷。（圖4）

隨著十七世紀以降，華人陸續渡海移住臺灣，從事開墾與商販。隨社會經濟根基穩固後，加以官方的文教政策、在地領導階層對於科舉功名的需求，以及派任官員的蒞臺倡興等，文教階層亦隨之發展，本地的儒學士紳自乾隆、嘉慶年間在臺灣逐漸成形，至咸豐、同治年間，更已成為臺灣社會的中間份子。外來與在地官紳士子，開始創造各式文本，包括方志、官方報告、筆記、遊記、詩集等等，這些文本後流回中國，於當地刻板、發行，並在清代已經高度成熟發展的印刷產業的背景下，

若干被編入特定的叢書當中。

光緒十七年（1891），由王錫祺（1855-1913）編纂，上海著易堂鉛印出版，堪稱清代輿地匯鈔叢書之最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該書縱19.7公分、橫12.8公分，型制袖珍簡便，但《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及其補編、再補編等卷帙浩繁，蒐羅廣博，於第九秩、第四十六冊當中，即收錄了眾多清代臺灣的相關敘事與記實文本。包括《平定臺灣述略》、《臺灣紀略》、《臺灣小志》、《臺灣使槎錄》、《裨海紀遊》、《番社采風圖考》……等二十一種清代臺灣重要文獻。（圖5）透過這種簡便袖珍的叢書，如欲快速查找翻閱，或是隨身攜帶，皆可謂便利。而以袖珍本的形式流動，亦可謂加速了某種「臺灣知識」的傳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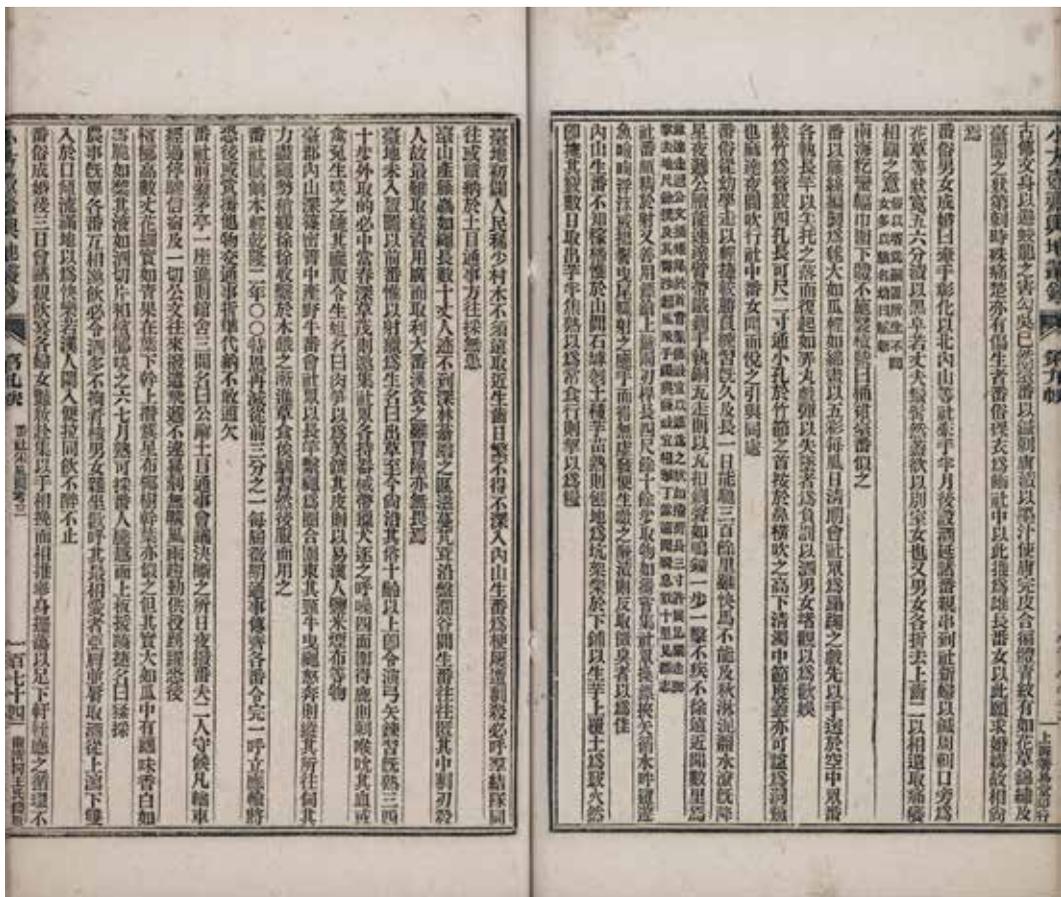


圖5 清 六十七著 王錫祺輯 《番社採風圖考》 清光緒17年南清河王氏暨上海著易堂鉛印本《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之一 贈善029960-03002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閱讀「袖珍」的臺灣傳統知識份子

隨著清代臺灣「閱讀階級」的出現，知識份子的大量閱讀書籍需求，致使諸多典籍、文集、科舉用書等書冊跨海而來。與民生息息相關的醫書、鸞書、善書、啟蒙書等，亦在民間需求下陸續引入。這些中文書冊內，應包含了若干尺寸略小、適合便於渡海攜帶的袖珍本書籍。在臺灣數位文士自身的筆記當中，即可見其提及閱讀或攜帶袖珍本的經驗。

如晚清自號為「窺園主人」的臺南仕紳許南英（1855-1917），在光緒十二年（1886）渡海前往北京會試，途中於一菜倉夜宿。因

仕途奔波於塵市鄉野間有感，遂作詩〈菜倉夜宿〉一首云：「顧我如稊米，今宵宿菜倉。孤村臨驛路，荒屋隔驢房。土銼添煤火，瓷盆蒸酒香。帝城雲樹裏，明日卸巾箱。」¹許南英所指的巾箱，或係泛指此趟為應舉所攜之書匣。但風塵僕僕千里移動，所伴身溫習的書籍必然以輕便為優先考量；且士子焚膏繼晷的經史科考用書袖珍本向來是小開本出版中的大宗，故可推想其所指者乃是此類書籍。

而部分臺灣士人，在提及自己的嗜好與藏書之際，或多或少也提及了巾箱本。如彰

化重要文士、曾任白沙書院山長的陳肇興（1831-?），曾在八卦山麓彰化縣城北門一帶耗巨資築「古香樓」作為書房與居住之所，樓中藏書甚豐。而其所唯一留下來的作品——《陶村詩稿》，更係目前所知清代彰化地區最早的詩人別集。在《陶村詩稿》當中，曾有〈憶故居〉一首，前半如此描述「小築吟樓號古香，半儲書畫半巾箱。山橫定寨青排闥，樹接豐亭綠過牆」。陳肇興自稱在古香樓的收藏當中，半數為書畫，半數則為「巾箱」。他擅長詩作，亦兼通丹青，如此的典藏與興趣相當符合。就詩中所云，陳肇興似乎自稱其擁有諸多巾箱小書的典藏；但細探其所稱的巾箱，應該謙稱藏書多是一些難登大雅之堂的書籍。畢竟進入了印本時代，大部分的巾箱本是低品質、低價格的坊刻本，故巾箱有時成為與高雅對立一面的庸俗書籍代稱，故陳肇興而有此借稱。²

但以其藏書之豐，當中包含數匣袖珍本書籍，或做科舉之用，或為閒暇時閱讀，當是不難想見。然可惜的是，在同治元年（1862）爆發、被視為清代臺灣三大民變之一的戴潮春事件中，彰化縣城被戴軍攻破，陳肇興「賣盡文章又賣田」方建成的古香樓也被人掠奪一空。故他在〈憶故居〉後段感嘆道「幾度栖遲同燕雀，一經離亂又豺狼。帑金掠盡門窗圯，惟有青苔對夕陽」。³也因此戰亂，現今我們已經無緣一窺其苦心收藏的書籍。

同樣以巾箱來謙述自身藏書的，尚有具「開臺進士」或「開臺黃甲」之譽稱的新竹士人鄭用錫（1788-1858）。鄭用錫自咸豐元年（1851），耗費重金著手興建「北郭園」，內有小樓聽雨、歐亭鳴竹、陌田觀稼、浣花

居、環翠山房、帶草堂等諸景，蔚為清代臺灣重要的園林。其詩作後亦稱為《北郭園詩鈔》，當中錄有二首七言律詩，分摘如下：

〈朽蠹〉

六經以外難窺測，老去方知學尚荒。
誰笑半生惟祭獮，漫陳百軸似搬薑。
可憐努力終無補，況值衰年更善忘。
自分此身成朽蠹，奈他嗜好在巾箱。

〈七十自壽〉

微軀七尺宰官身，彈指春華去日陳。
家世巾箱多茹苦，生涯鐘粥諱言貧。
千章喬蔭承先澤，一領寒氈作替人。
緩帶敢同羊太傅，金環了了憶前因。⁴

〈朽蠹〉一詩道出其步入晚年後，深感自身能力有限，但閱讀以「巾箱」代稱的市井書籍，仍是人生的嗜好。而〈七十自壽〉則以巾箱來指稱世代書香，鄭用錫雖幼承庭訓，但詩中謙稱其家世並非顯赫富裕，故藏書多非精品，僅是閱讀自娛之用。

從雇工雕版到本土出版的萌發

臺灣作為文教的後進地區，固然在鄭氏王朝統治時期，已出版有《大統曆》等，⁵也可見有若干印刷的公文，但書籍仍多半仰賴自內地省分購入。後隨官書刻印、文集出版、民間類書等各式所需，因而漸次有在地開版製書印刷之需求。然如同連橫（1878-1936）所指出：「活版未興以前，臺之印書，多在泉、廈刊行。府、縣各誌，則募工來刻，故版藏臺灣。」⁶連橫在1906年至1915年間採編的《臺灣詩乘》，即曾記載「蓋以臺灣剞劂尚少，印書頗難」，意指甚至連雕版工匠都很少。由於受限於本地技術人員的不足，臺地的印書需求初始或在對岸刊行，或臨時聘請技工



圖6 清 余文儀修 黃脩纂 《臺灣府志》 清乾隆28年刊本 故志003321-00333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清代臺灣也逐步出現本地的印刷產業。

前來雕刻製版，再將書版留於臺灣，以便未來再次刷印。

要至十九世紀，隨著社會需求的成熟，臺灣方逐漸發展出在地的製版印刷專業。十九世紀末的《安平縣雜記》即指出今臺南地區有「刻字匠：刻木板書籍及玉、晶、石、牙、角篆隸印章」，已有專門刻板的工匠。當中經營出版最著名者，莫過於位於府城上橫街統領巷（今臺南市永福路二段一五二巷一帶）的「松雲軒」。松雲軒由原籍福建省

泉州府晉江縣的盧崇玉創立，至晚在道光初年已經開始營運，後曾刻印的種類甚多，包括印刷善書、經文，出版輿圖、科考範文、詩文集、童蒙讀本、譜牒籤詩等物。⁷如《高王真經》、《金剛經註解》、《白衣神咒》、《文亨文集》、《三字經》、《潘公免災寶卷》、《澄懷園唱和集》、《千金譜》等。連橫稱松雲軒出版品之質感「紙墨俱佳，不遜泉、廈」，⁸顯示這個後起之秀，其品質亦可與泉州、廈門一帶的書坊比肩。（圖6）

除了量身訂製的款式外，松雲軒主人盧崇玉在製印時有偏好的格式，他習慣將刻書書版處理成每半葉高度介於 12.3 至 14.5 公分，寬度約 8.8 公分的版框。使用這種尺寸者除了善書、敬灶書冊等，也包括如《楊忠愍公年譜》這類書籍。⁹ 以此次在「古人掌中書——院藏巾箱本特展」內展出藏家黃震南的《居家必用千金譜》為例，其書高約 16 公分，寬約 10 公分，版框高約 13 公分，寬約 8.5 公分，末頁刻版標示「咸豐壬子冬月刊 臺郡松雲軒藏板」，即符合松雲軒慣行刊印的小開本尺寸。¹⁰

《千金譜》是十九世紀流傳臺灣、廈門一帶的閩南語讀本，根據連橫的說法，其為：

貧家子弟無力讀書，為人學徒，以數錢買「千金譜」一本，就店中長輩而讀之，可識千餘字。是書為泉人所撰，中有方言；又列貨物之名，為將來記帳之用。若聰穎者，可再讀他書及簡易尺牘並學珠算，不三、四年可以略通文法，而書算皆能矣。

是一本價格低廉、專為中下階層及未曾習字唸書者所閱讀的書，所記之事偏重於商業方面，如貨物、交易情況等。而以作者為泉人的身份來看，所舉之事應當是閩臺一帶的商業活動。且這種供作基礎教學的書籍，其書中之內容應當是以當時最為大家所熟知的情況來做為範例，方能讓沒有讀過書的讀者了解其含意。由於屬於商業入門啟蒙書，有必然的市場需求，這類書籍刷印往往可有一定的數量，故常製作較小的版寸，以圖盡早快完成製版，並刷印成攜帶方便的樣式以供大量通行。（圖 7）

另一些於臺地刻製的宗教類書，也採用



圖 7 | 不著編人 《居家必用千金譜》 清咸豐2年刻本 黃震南提供

較小的尺寸。主要與宗教類書刊行普遍，諸多助印者經常刷印有關，故採取較簡便的刻版。如臺南的德化堂，係府城內齋教龍華派寺廟，創建於道光十八年（1838），現為市定古蹟。該堂因應信眾需求，建成後便陸續委請包括松雲軒在內的刷印業者開版印製各式經籍，如就一批於民國八十六年（1997）德化堂（圖 8）整修時於閣樓中發現，現已被臺南市政府列為古物的木刻藏版來觀察，其總計有二百八十六片，製作年代跨越清道光至日治期間。內容包括「金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註解（松雲軒雕版）」、「佛經雕版」、「龍華齋教科儀文獻雕版」、「龍華齋教經卷文獻雕版」等。部分雕版尺寸即長不到 20 公分，寬約在 20 至 23 公分間，版式袖珍。

故在臺灣所刻印的小開本，以實用性的日用類書或是宗教書籍為主。造成這種情況除了書籍本身的性質，也可能有以下的因素：一、刻工價昂：如清代府城米街進士施瓊芳（1815-1867）即曾明白點出「臺地工料頗昂，所有風世諸書，多從內郡刷來」。¹¹ 二、原料



圖8-1 現為臺南市定古蹟的德化堂，在清代曾向松雲軒等書坊訂刻諸多小開本的佛經，刻板並流傳至今。 曾婉琳攝

有限：臺地雕版木料在清代開採仍有限、紙張又多仰賴貿易輸入，小開本尺寸遂成為選擇。

但印刷技術在臺灣逐漸萌芽發展，為臺灣本地的印刷品來源，增加了更多元的管道；相對於抄寫，印刷的方便性也可讓臺地的士子百姓有更多接觸讀物的機會。

近代印刷革命的衝擊

十九世紀中葉以降，隨著西方勢力對中國的衝擊，西式印刷技術也為中文的出版事業帶來新的局面。臺灣同樣無法置身事外，連橫便點出：「海通以來，歐洲輸入印書機器，用鉛製字，則今之活版也。」¹²活字印刷技術在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展開後，隨著機械設備的開發應用在印刷設備的改良上，不僅提升印刷的效率、品質，促使印刷品更為普及，並使出版物內容多樣化，可謂是革命性的進展。目前臺灣可考的西洋活字印刷機設備，係十九世紀晚期，英籍牧師巴克禮（Thomas Barclay, 1849-1935）所獲贈的設備，其後巴克禮用以出版了《臺灣府城教會報》，該刊物



圖8-2 德化堂內部景況，清雅肅穆。 曾婉琳攝

至今仍持續發行。惟這種活字印刷技術，僅用於教會的刊物，對於臺灣整體的出版市場而言影響有限。

對臺灣衝擊更大者，係來自於中國與日本兩地的出版變革。尤其至十九世紀晚期，隨著西方印刷技術在中國被逐漸廣為採用，如石印的平版印刷技術等，可較快速的製版，並降低製作成本，故石版油墨印刷的書籍、畫報等蓬勃問世，促進了新一波的中文書籍流通，連帶也擴散至臺灣。即便是光緒二十一年（1895，日明治二十八年），中日兩國簽訂馬關條約，臺灣被割讓予日本，但臺海兩岸的交流並未斷絕，以臺灣人為對象販售漢文圖書，仍主要自中國引進圖書銷售，許多在上海、福州、泉州等地刊行的中文書



圖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於臺灣流通的各式小開本。 謝明松攝

籍，遂持續通行於臺灣書肆間。（圖9）

如展示的《中外戲法圖說》，可謂已失傳的明代《神仙戲術》之外，可謂是現存最早的中文魔術書籍。戲法人人愛看，奇妙技法卻屬機密，而作者唐再豐，藉其學習各種戲法三十餘年之經驗，蒐集三百多套戲法，將之分成六冊十二卷，付諸石印，輔以圖解，讓包括臺灣的讀者也一窺箇中巧妙。（圖10）

而另一股影響力，則是來自於殖民臺灣的日本。現今日本的袖珍書，以統稱為「文庫本」的小型開本為要，至今仍是該國出版市場的主流之一。東瀛的小型本風行，可上溯至江戶時代。江戶時代因政治的相對安定，造就了蓬勃的經濟發展，而商業活絡讓庶民的生活更加豐富有趣。至十八世紀，隨著平民社會影響力與經濟實力的增強，加以都市內的庶民亦有一定的識字率，為供應這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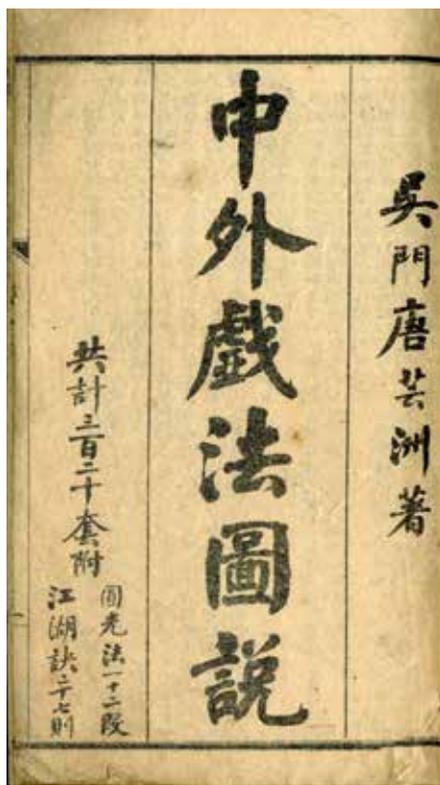


圖10 清 唐再豐《中外戲法圖說》 清光緒15年石印本 黃震南提供

興讀者休閒娛樂，諸多庶民通俗讀物蘊育而生，這些被統稱為「戲作」的出版品，內容多半為平民百態、風月記事、歷史典故、滑稽段子或情色文學等雖是難登大雅之堂，卻實實在在呈現平民文化之讀物。而部分的戲作尺寸不大，約高 17 公分，寬 12 公分左右，輕巧方便。¹³

至十九世紀中葉，隨著受到西力的衝擊，包括金屬活字印刷、石印、西式裝訂等歐美書籍的印刷方式也開始為日本所援用。而在歐洲已經風行日久的小型開本，由於製作簡便、攜帶容易，遂成為若干書商及文人仿效援引的範本。明治十六年（1883），先是有春陽堂所發行的「實錄文庫」；明治二十四年（1891），知名的文士、政治家德富豬一郎（1863-1957）所成立的民友社，也發行「國民叢書」，帶動另一股風潮。這類以系列叢書為號召、類似今日成套文庫本系列的小開本書刊，明治維新後配合人們的求知熱潮，開始佔有一席之地（但初始不一定價格低廉）。到了二十世紀，現今仍在發行的岩波文庫、新潮文庫等多種文庫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更掀起了人們閱讀文庫本的熱潮。（表一）

各種日本文庫本蓬勃的發展，也擴張了日本時代受新式教育的臺灣學子閱讀的契機。尤其隨著日本語使用人口的增加、讀者的出現，圖書內容與行銷取向也因此改變，加以殖民地統治下的圖書出版流通管制，漢文書籍與日文圖書在閱讀市場內呈現了消長變化。以 1921 年至 1930 年為例，從日本輸入書籍及雜誌的貨物價值，由 266,483 元增加至 726,889 元，成長幅度將近三倍；歷年冊數則超過七十萬冊以上，當中並包含了不少文庫本。

表一 日本文庫本發展大事記

作者整理

年代	事件
江戶時代	因應時代需求，已有諸多袖珍本書籍出版
1868	明治天皇即位，明治維新開始。
1883	實錄文庫（春陽堂）開始發行
1891	國民叢書（民友社）開始發行
1903	袖珍名著文庫（富山房）開始發行
1910	袖珍文庫（三教書院）開始發行
1911	立川文庫等以少年為目標的文庫本開始發行
1914	アカギ叢書、新潮文庫開始發行
1927	岩波文庫（岩波書店）開始發行
1928	新潮文庫第二期發行
1929	改造文庫（改造社）開始發行
1931	春陽堂文庫（春陽堂書店）開始發行
1933	新潮文庫（新潮社）再度發行
1937	博文館文庫（博文館）開始發行
1938	富山房百科文庫（富山房）開始發行
1939	教養文庫（弘文堂）開始發行
1940	世界文庫（弘文堂）開始發行
1944	改造文庫發行中止。改造社、中央公論社等被命令解散。
1945	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諸多文庫版書籍出版中斷。



圖11 | 包括日本文庫本在內的各種精巧小開本，由於攜帶方便，現已蔚為市場主流之一。 謝明松攝

以岩波文庫為例，1913年創立的岩波書店，於1927年仿效德國 Reclam 文庫設立「岩波文庫」，該文庫選擇各式經典書籍予以重新考訂、翻譯，版型採高15公分、寬10公分的袖珍形制刊行；書價並以相當平實的價格發售。從發行初始至1945年為止，岩波文庫共出版了1,531冊，當中不少成為知識份子的愛藏。如前總統李登輝，他曾表示因甚喜購書、藏書龐大，一度考慮要開舊書店維生。光是岩波文庫，他便購有七百冊，這數量佔了當時該文庫發行總數的45%。¹⁴而岩波文庫本因袖珍版型易於攜帶，即便學生受徵召入伍，多數也會隨身選帶，以便空暇時閱讀。（圖11）

本地的印刷事業變革

現代化印刷技術的引進，印刷品製作成本得以降低，並縮短製版製作的流程與提升印刷品質。日治時期的活字印刷，提供了速度化、標準化的社會場景。隨著殖民統治的展開，日籍人士也陸續在臺灣開設書局、出版社等，並向日本本國的印刷廠訂製臺灣所需的參考書、辭典，亦出版旅臺日人作家的作品等等，當中包含了若干以小開本形式所製作者。

另一個在臺灣持續發行的小開本出版品，則來自於官方。近代統治的機制之一，在於利用大量官方出版品，以頒布律法規範、宣揚政策治績、進行國民教育、從事實業指導

等等。這種官方出版的小冊子啟動時程甚早，如在日人治臺的隔年（明治二十九年，1896），臺灣總督府殖產部便計畫將於領臺初期所進行的各種調查成果報告，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¹⁵ 這種官方書籍，初始多半在日本國內刷印。但隨著臺灣印刷業的逐步興起，也漸可在臺灣本地印刷出質量兼具的小開本政府出版品。（圖 12）

為推動戶口調查，臺灣總督府發行尺寸袖珍的《戶口要鑑》，委由當時臺灣發行量最大的臺灣日日新報社來刷印，其內容如報導所示：

今年二月。本島實施戶口規則。其不慣於解釋法文。並稟報書式等。在本島人自不待言。即當經理之警察官。亦多困於疑問。其時警察本署警部藤

村岡野兩氏。乃合著戶口鑑……然以此紙數甚多。不便攜帶。因就此書中最要部分抄出。名曰戶口要鑑……實為簡便袖珍也。本書擬以邦文漢文兩樣出版有邦文漢文兩兩相對照之利便。其於各稟書□以有要觀閱邦文。故其名稱分為戶口要鑑與漢文戶口要鑑二種。印刷邦文漢文相對照製本。由本社發賣。¹⁶

該社在二十世紀前期，至少已有高速輪轉機一臺、輪轉機三臺、平盤十二臺、維多利亞式印刷機一臺、石印機二臺、石版手搖機八臺、自動活字鑄造機三臺、製本用機械二十餘臺等。這些機器除了供應報紙發刊，也兼營書籍、官冊之印刷。民國元年（1912），奉福建省制軍松鶴齡命令，以觀察員的身份



圖 12 20世紀前期 臺灣總督府 日本時代風景繪葉書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日本於臺灣展開殖民統治後，開始運用近代印刷技術出版各種小冊。

來臺考查的中華民國官員施景琛，在他來臺見聞錄〈鯤瀛日記〉內便指出：「報分漢文、和文兩種，日出三萬餘紙。印報之法，先將鉛字板製成紙模，再將紙模鑄成圓形鉛板，嵌入機器，周轉極速……。社中機器數十部，兼營印刷業。總機關純用電力。另有五彩石印，用人工印刷。又有化學室製造銅板。」¹⁷對於臺灣日日新報社的刷印產出能力甚感驚奇。

島內的臺、日民間印刷業者，也著手援引、仿效西式印刷技術，約在 1915 至 1930 年間，臺灣的出版市場逐步由雕版（木刻）印刷，轉型成為活版印刷。如展出的《最新流行紅鶯之鳴歌》，高約 15 公分、寬約 9 公分，乃日治時期流行歌本（歌仔冊）。其內容係以女子口吻，提倡追求自由戀愛，充滿渴望愛的心情，並收錄包括「跳舞時代」、

「水鄉之夜」、「琵琶恨」等當代名曲。這類書籍的出版，反映出庶民思維與流行文化，並讓本土的出版品項得以更形多元擴張。（圖 13）而另一本在展場內展示，由臺灣總督府文教局於昭和十三年（1938）編纂，提供在福建活動日本人學習閩南語會話的《日閩會話》，高 13 公分，寬 10 公分，則是由位於臺北市榮町¹⁸內、日人中村誠道所開設的松浦屋印刷部印行，反映了在臺日商印刷袖珍小冊的實績。（圖 14）

小開本出版品，也成為臺灣人士爭取自身權益的手段之一。如昭和十四年（1939）十二月，由知名政治人物吳三連（1899-1988）所寫成的《臺灣米穀政策之檢討》小冊子，旨在為臺灣農民爭取利益，反對臺灣米輸日的相關限制。吳三連將書稿交由岩波書局印



圖13 不著撰人 《最新流行紅鶯之鳴歌》 和源活版所 1934年出版 黃震南提供 王聖涵攝



圖14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編 《日閩會話》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1938年出版 黃震南提供

行，出版後並將之分送上、下兩院議員以及相關人士。惟因觸犯殖民政策，該冊子不久後便被禁止發行。¹⁹ 未在臺灣出版，而直接運用日本的出版商來宣揚自身理念，可見其對善用當時出版機制的一面。

由機器印刷、西式裝訂技術所帶來的印刷出版技術革命性轉變，把臺灣的閱讀階級在二十世紀前期區分開來。1920 及 1930 年代的讀書人，在接觸袖珍小開本書籍時，與他們清朝的前輩們相較有了更快速且更多元的選擇。

多元閱讀的逐步建立

現今在臺灣通行的國內外各式小開本書籍，因其攜帶方便、價格低廉，已蔚為書市的主流之一，並是諸多愛書人的選擇。而這樣的趨勢並非肇始於晚近，其背後亦有一段值得細細追尋的軌跡。所謂「無印版則思想閉塞，學術停滯，不能人人讀書」，²⁰ 書籍作為文化訊息之重要載體，觀察各時代小開本的變貌，可讓我們從不同的面相，體會臺灣閱讀市場的轉躍與多樣。

本文蒙審查人給予諸多寶貴意見，特此申謝。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註釋

1. (清)許南英，《窺園留草》，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七種（臺北：臺灣銀行，1962），頁7。
2. 井上進，〈巾箱本的雅與俗〉，《故宮文物月刊》，430期（2019.1），頁23。
3. (清)陳肇興，《陶村詩稿》，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四種（臺北：臺灣銀行，1962；1878原刊），頁102。
4. (清)鄭用錫，《北郭園詩鈔》，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四一種（臺北：臺灣銀行，1959；1871原刊），頁39、64。
5. 目前存世所見大統曆，包括藏於英國劍橋大學莫德林學院（Magdalene College）佩皮斯圖書館（Pepys library）、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牛津大學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等地，出版年份不一。
6. 連橫，《雅言》，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六六種（臺北：臺灣銀行，1963；1933原刊），頁121。
7. 楊永智，《明清時期臺南出版史》（臺北：臺灣學生，2007），頁284-290。
8. 連橫，《雅言》，頁121。
9. 楊永智，《明清時期臺南出版史》，頁293、301。
10. 惟該書是咸豐二年（1852）初版刊行，或是日後再行刷印者，尚待進一步的分析。
11. (清)施瓊芳，《石蘭山館遺稿》（臺北：龍文，1992），頁7。
12. 連橫，《雅堂文集》，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二〇八種（臺北：臺灣銀行，1964），頁24。
13. 徐辰，《教養之託付——日本文庫本淵源》（臺北：遊目族文化，2017），頁28-30。
14. 李登輝，《臺灣的主張》（臺北：遠流，1999），頁41。
15. 〈殖產部の小冊子〉，《臺灣日日新報》（1896年7月26日），2版。
16. 〈戶口要鑑出版〉，《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8月15日），2版。
17. 施景琛，《鯤瀛日記》，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八九種（臺北：臺灣銀行，1960），頁46。
18. 含今臺北市中正區的衡陽路、寶慶路、秀山街之全部及博愛路、延平南路之一部分區域。
19. 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記，《吳三連回憶錄》（臺北：自立晚報，1991），頁91-92。
20. 連橫，《雅堂文集》，頁24。